

试析李大钊与研究系的诀别宣言——《别泪》

韩一德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在李大钊一生中,曾与研究系发生密切关系,他留学日本有赖于研究系的资助,但思想迅速发展中的李大钊已与研究系的政治理念产生根本分歧。《别泪》一文既是对他研究系的诚恳忠告,也是其坚定政治理念的宣言。

关键词:李大钊;研究系;别泪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0)01-0001-03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0.01.001

Analysis of Li Dazhao's Declaration of Parting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Institute:*Bielei*

HAN Yi-d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Institute in his life, who was sponsored by it for his study in Japan. However, with his ideological growth, his ideas fundamentally diverged with its political concept then. The article *Bielei* (parting tears) was Li Dazhao's sincere advice to the Constitutional Institute and also the declaration of his firm political concept.

Key Words: Li Dazhao; Constitutional Institute; *Bielei* (parting tears)

1916年9月4日,李大钊在《晨钟报》发表《别泪》一文,次日发表《守常启事》,声明“今以私事萦扰,急思返里”,辞去该报编辑主任一职,“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8月15日,他在《晨钟报》发刊词中还曾乐观地指出:“吾国最近革命运动,亦能举清朝三百年来之历史而推翻之。”“义师勃兴,南天震动,而一世之奸雄,竟为护国义军穷追以死。今虽不敢遽断改革之业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1]170}号召青年们以《晨钟报》为友,以国家为重,努力自勉,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使命,奋勇前行。谁能想到他会那么快就离开《晨钟

报》,辞职声明中的“今以私事萦扰,急思返里”不过是一种托词,《别泪》一文所述才是他决然告别的真正原因。

《别泪》^{[1]199-200}是一篇很特别的文章,它以小说的形式,借未婚少女的离别赠言,喁喁细语,如泣如诉,所表述的确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意志。《别泪》文中首先将“华氏一族”分为三支(喻指当时的中国政坛),其中甲支“专好结交官僚豪霸子弟,因之浸染恶习甚深”,喻指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豪强;乙支“好问人间不平事,间有流于躁暴者,但其奋斗勇往之精神,盖百折而不挠”,喻指国民党革命派;丙支“多文

作者简介:韩一德(1932—),女,辽宁大连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弱书生,尚清谈,喜批评是非,文人墨客,常近接之”,所指汤化龙、梁启超、孙洪伊等的研究系。在这三股势力中,甲乙两支不睦,而丙支势力最微,于是群相与谋,拟亲近甲支以自保自存。这里指出了汤化龙等谋划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权的危险局势。李大钊在文中自比少女桐子,将青年迪穆比为汤化龙等,真诚地写到桐子“幼孤”,由迪穆善视之,才以身相许。只因迪穆仍欲亲近甲支,桐子不忍见同根相煎相残走上歧路,决然离去。在这里桐子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泪眼频频,声泪俱下,作临别之谏言,希望他能有忏悔的一天,到那时即使身在穷途,亦将效命于君子之前,在艰难困苦中,能相救助,相逢话旧。李大钊这篇具有深刻政治意味的文章,以桐子与迪穆一对恋人的别离,娓娓道来,真诚而恳切。这一作品的特点,在李大钊一生的文章中极为少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这种情况,应该与李大钊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不无关联。

1913 年,作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才俊精英,李大钊接受研究系的资助赴日留学。汤、孙家族在清代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学术地位,在清末的政治舞台雄心勃勃,汤化龙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成为民初进步党的首领。为了培植年轻的得力人才,以每年三百银元的优厚条件,送李大钊等去日本。那时出国留学大多为富家子弟或有政治背景的人,以李大钊的家庭条件要想出国留学根本没有可能,但由于受到资助,当时李大钊没有经济方面的负担^{①[2]}。李大钊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资格免试进入早稻田大学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部学习,证明了他的实力非同一般。所以对研究系来说,资助他留学是一笔颇具远见的政治投资。李大钊留学期间,汤化龙还托付他关照其在日本求学的年幼长子汤佩松。笔者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曾访问已身为中科院植物所专家的汤佩松先生,听他讲当年受到李大钊的

悉心照顾、辅导功课、陪同活动,对此至今他依然感激不尽。

在日本,李大钊犹如放飞的雄鹰展翅翱翔,在思想上不仅脱离北洋体系的束缚,也使得研究系无法控制。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的课程设置极为严格而繁重,第一学年即有 11 门考试课程,李大钊有 8 门课程成绩较好,尤其是“经济学评论”“应用经济学”等课还达到 85 分以上的优等,作为留学生实属不易^[3],因而受到著名学者福田和民、美农部达吉等的重视。同时,他继续保持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老师、左翼政治家吉野作造的联系。这一切不仅使他的知识领域更加深广,而且使他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在这期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及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加紧,使他更清醒地认识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展现出他的能力与才华,组织神州学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尤其是他结识了章士钊,进一步接触西方的政治理念,思想迈向新的高度。1916 年,李大钊写出了《民彝与政治》这样深刻阐示人文理念与治国根本的宏篇巨作,标志着他彻底告别了《言治》时期期待英雄的历史观,确立了“民彝”这一政治理念,从而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遗憾的是,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涯无果而终,因为他的出国与回国都由不得自己。1916 年 2 月,他应研究系的紧急召唤一度回到上海,返日之后又于 5 月被召回国。

在讨袁的二次革命中,研究系放弃以稳健自居、维持现状的立场,转向与国民党联合,参加讨袁护国运动,企望在动荡的政局中有所作为。梁启超远赴云南与蔡锷护国军联手,汤化龙等则在上海成立宪法研究会积极谋划。据白坚武日记载,研究会频繁召集会议,讨论局势,制定策略,“急盼守常归”。由于当时紧迫需要创办报刊以宣示本派对时局的主张,而主持这

^① 据日本学者考察,当时在东京,包括每日三餐、三个房间的民宿,每月只需 10 元左右;早稻田大学大学部的学费每年 90 元左右。所以李大钊有能力购买书籍和观光旅行。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李大钊故居仍存有大量他留学时期购买的书籍。

项工作的最佳人选非编辑过《言治》《神州学刊》的李大钊莫属。于是研究系急召他回国，遂有由汤化龙任社长、李大钊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创立。不久李大钊即因缺课太多，被早稻田大学除名。据此可以说李大钊是为研究系之需而不得不放弃学业的^[3]。

然而《晨钟报》创刊不到一个月，局势发生了急骤变化。袁世凯暴死之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研究系的成员如李大钊在《别泪》中所述“多文弱书生，尚清谈，喜批评是非”，并无真正的实力。在当时的中国，不掌握军权的政治派别要想有所作为实非可能，那些研究来研究去的种种方案，在段祺瑞一伙新军阀眼中不过是一纸空文，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系的分化已成必然。结果是，汤化龙投靠段政权，做了北洋政权的众议院议长；梁启超当上了财政总长，成为军阀统治的忠实帮凶；孙洪伊则追随孙中山加入到国民党的行列。据高一涵回忆：“当时汤化龙在沪，欲招纳人才为己助，并谓守常，誓欲十年在野，专司评政，因创晨钟报于北京，托守常与余为编辑。并谓言论绝对自由不加干涉。守常从沪到北京组织报社，余返安徽省母，家居二十七日，守常已三电促余北上。迨我至北京，守常已脱离该报矣。因汤化龙到北京后，即联合徐树铮与孙洪伊相抗，要以晨钟为攻击孙的工具，迫守常著论文，守常因与孙交至厚，直孙而曲汤，汤怒，阴令人撤去守常论文，易以攻孙之论著。守常因此去职。余到时，事已不可为，故亦退。”^[4]

汤化龙为投段政权所好，极力主张将省制订入宪法以维护北洋军阀的中央统治，尽管如此，仍遭到排挤，不得已于1918年初“出洋考察”，最后在加拿大为国民党籍华侨枪击毙命，结束了其曲折的一生。梁启超曾为讨袁出力不少，尤其他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为阻该文发表，袁世凯贿以二十万银元，其所不受；加以恐吓，其所不屈。该文对导致袁世凯称帝的失败起了重要作用^[5]。段祺瑞内阁成立后，梁启超虽曾一度出任财政总长，但终因无法挤进北洋权力的中枢，不久之后也被迫“出洋考

察”。政治实践的失败并不能影响其在学术领域的辉煌，他以常带情感、通达明晰的笔触，一生写了千万字的启蒙文章，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李大钊与孙洪伊的良好关系则一直保持到最后。孙洪伊是直隶省咨议局议员，也是天津法政专门学堂的捐资者与校董。他多次发动请愿，反对清政府的立宪骗局。李大钊当时还是学生，学识超群，文章磅礴，有炽热爱国心，与同窗白坚武并称“法政二杰”，深受孙洪伊赏识。孙大力支持李大钊筹建法政学会，创办《言治》月刊，后来又与汤化龙共同资助李大钊留学日本。据白坚武日记载，李大钊留学期间两次归国参加宪法研究会的活动，都住在孙洪伊的上海寓所。李大钊离开《晨钟报》后，参加了由秦广礼、田解等北洋法政学会的同仁创办的刊物《宪法公言》。该刊也得到孙洪伊的捐助，并在政治倾向上与国民党保持一致。1922年李大钊与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其后参加国民党，孙洪伊也从中起到联络促进作用。李大钊遇难后，孙洪伊仍对其遗属有过关照^[6]。

此后李大钊在《宪法公言》等刊物继续发表言论，反对军阀统治的中央集权，在《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等文中，深刻批判汤化龙、梁启超等伪调和的政治理念，彻底与研究系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念划清了界限。然而《宪法公言》没能维持多久，李大钊的生活也一度陷入困境。1917年初，章士钊主持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创立，李大钊成为主要撰稿人，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政治思想也从此迈上新台阶，为后来他关注和研究世界大势、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走向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到1916年底，李大钊已与研究系彻底决裂，但他没有像猛士一样挥举利刃，却以《别泪》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诀别，这与他的为人风格不无关系。终究汤化龙、孙洪伊都曾是有恩于自己的人，不忘记艰难困苦中，得其援助之情。但此时李大钊已看透北洋军阀的反动实质和看清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又无法挽回汤化龙等的堕落，遂决然而去。然而在“掉头而去”之时，仍不忘劝告他们不要走得太(下转第28页)

走”的朴实歌词以及动听的民谣旋律,在传唱中无形地培养了大家的兴趣,产生了一定要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的强烈愿望。另外《郑州的记忆》《青藏高原》等歌曲的传唱更成为培养人们爱上一座城市的好方法。因此应该鼓励有才华的歌曲创作者针对唐山的工业遗迹和城市形象进行系列歌曲的创作,并让唐山本地的知名歌手进行演唱,作品的网上点击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给予物质奖励。相信这类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歌曲,会为唐山城市形象提升带来新契机、新机遇。

第二,网络游戏培养策略。如今网络游戏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手游的快速发展,各种手游画质精美,玩家粘度大,因此可与一些优秀游戏制作公司进行合作,打造关于启新 1889 文化创意产业园、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模拟实景游戏 APP,特别要对特色场景进行细致化的制作。一方面凸显游戏的真实感,另一方面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能让玩家细致地了解工业遗迹的概况。另外还可以举办“游戏玩家线下‘嗨’”活动,吸引他们到实体公园进行真实体验。要不断进行产业链的延伸,通过制作和售卖游戏场景模型、装备等来提升经济效益,进而为唐山城市形象的提升奠定物质基础。通过游戏来培养玩家的兴趣,并吸引玩家来到真实的场景体验,极具唐山特色的工业遗迹会在更多受众心

(上接第 3 页)远,应“于断崖绝壁之前,稍一自持”^{[1]199},不要堕入沉沉之深渊。李大钊与研究系从结识到别离的这段“姻缘”,如同他曾经有过从拥袁到反袁的历程一样,是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人生经历。李大钊的文风向来温文尔雅,说理而不强词,即使在尖锐问题的辩论中,也从不使用尖刻的语言。可以说,《别泪》是李大钊与研究系缘尽恩断的诏告,也是他为人处事常怀温厚长者之风的体现,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他的伟大人格。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1 卷 [M]. 中国李大

目中形成深刻影响,为唐山城市形象的塑造起到推动作用。

五、结语

城市形象的塑造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在社会发展、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唐山的城市形象也在不断的转型提升,能承载展示唐山城市形象的特色元素也在不断地被挖掘。唐山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重工业城市,保留下来的启新 1889 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等工业遗迹是唐山这座英雄城市特有的名片,在塑造唐山城市形象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工业遗迹的传播优势,为唐山的城市形象添加独具特色的内容,进而提升唐山市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李蕾蕾. 逆工业化与工业遗迹旅游开发: 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 [J]. 世界地理研究, 2002(3): 57 - 65.
- [2] 闫永增. 唐山近代工业遗产调查 [J]. 唐山学院学报, 2016, 29(4): 22 - 27.
- [3] 姜晔. 工业遗迹保护初探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2(3): 49 - 52.
- [4] 彭聪. 媒介素养理论溯源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责任编辑: 李亚平)

- 钊研究会, 编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 后藤延子. 李大钊思想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134 - 135.
- [3] 森正夫, 韩一德, 刘多田.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 [J]. 齐鲁学刊, 1987(1): 74 - 75.
- [4] 高一涵. 李大钊同志传略 [N]. 中央副报: 第 60 号, 1927-05-23.
- [5] 李剑农. 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17.
- [6] 罗宝轩. 李大钊与孙洪伊 [G] //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9: 376.

(责任编辑: 李秀荣)